

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的启示：建构文学理论面对文学 实践的中介范畴^{*}

高楠

【提要】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正遭受方法论的束缚，二元思维的方法及观念化的方法，使文学理论僵化且远离文学实践。在这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对于现实重要问题的研究，及求解这类问题运用的由一般提升为具体的逻辑方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论突围产生重要的引导意义。而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又专门分析与阐释了这套方法，更使这种引导意义明晰而且深刻。从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从范畴关联到关联范畴的相互作用，从范畴关系思考到与现实具体的对应参照，从逻辑思维到思维的历史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揭示与运用的这套方法，是中国文学理论方法论突围的根据。

【关键词】文学理论 文学实践 中介范畴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3—0064—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其中的钩沉取极的洞见，鞭辟入里的阐发，入木三分的剖析，把人类历史延伸的生存发展的秘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这类最基础也最简单的问题入手，解析得淋漓尽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功，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成功，渊博知识的成功，充分占有与娴熟运用理论与实践资料的成功及深刻而广袤的历史视野与世界视野的成功，同时，也是对西方18世纪以来代表性的理论思辨方法予以实践性颠覆与变革的成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被马克思集中运用与阐发的由简

单范畴上升为具体范畴进而求解重要的现实历史问题的方法，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走出枯燥的理论思辨，走出观念思辨模式，同时也走出自得其乐的肤浅的经验式理论描述路径，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理论方法的引导。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下 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对应性

马克思所展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14BZW004)和辽宁省社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L13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实历史的生产关系及生产过程的学说。它从现实历史的生产阶段与生产过程中，抽取概括出人类历史各种生产活动都具有的人类一般规律——“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①进而综合地、总体性地考察这些生产一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差异性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差异性抽象，再在不断细化的差异性研究中，逼近具体的、有待揭示的现实社会生产的总体问题，即对以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理论分析。循着这样的思路，马克思从最简单又最具有人类历史普遍性的生产一般展开思考，进入生产的历史规定性，即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对这类关系，马克思进行着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差异性的把握，并随时把这种把握纳入历史阶段性的总体性中，发现与揭示其中的差异性的一般延续性，叩问隐含其中的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矛盾与统一的相互生成、相互作用、相互构成的关系；又进一步由生产的关系性出发，将之具体化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关系，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这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关系思考过程。对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研究的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的关系性、互构性、相互作用性及从差异性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与文学理论的、文学实践的研究对象及思考问题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对应性；而且，

文学实践，从文学生产角度理解，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生产范畴，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因此，带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建构问题学习与领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要阐发的并在要点问题上典型展开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理论建构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引导意义。

尤其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在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下，由于自身理论根基前提性地深扎不够——这里有历史原因及时代原因造成的传统割裂，有理论转换机制的运作乏力，也有理论研究远离实践的盲目倾向，因此不同程度地存在非语境的观念性接受、非问题的逐潮性接受以及非主体的套用性接受状况。在这种接受状况的作用下，文学理论研究淡化文学实践甚至远离文学实践的问题严重到不下大力量予以扭转，则文学理论很难在如火如荼的文学实践进程中有所作为的程度。这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寻求方法论的引导，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引导意义——这是根据当下文学理论的问题性状况提出的要点性的引导意义，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简单或比较简单的范畴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是理论系统性地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包括文学实践问题的正确方法，即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综合。

第二，相互关联的范畴研究，要分别考虑相互关联的每一个方面，揭示其相互关联的性质与相互作用，并在现实实践过程中统一地求解其中的矛盾。

第三，范畴及范畴关系思考，包括范畴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性、范畴关系规定性思考,须经常地与范畴及范畴关系所由生成的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保持参照的对应性,既要面对头脑或理论领域的思想过程,还要随时对应确实发生并仍然发生的现实过程。

第四,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它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

以下内容围绕这四个要点,结合当下文学理论状况,逐一展开分析。

二、由简单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是系统性地思考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入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①马克思由此提出一个系统地思考现实社会状况的起点问题。为此,马克思提出由抽象进入具体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范畴。

作为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与通往思维结果的那些具体的若干中介性的比较具体范畴,形成一种由此及彼的上升式逻辑关系。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点,即简单范畴的原发性与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差异性的历史条件性。在马克思看来,简单范畴是那些在人类初始阶段简单的生存结构中既已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的关系的抽象;这些关系在随后不断复杂化的历史发展中,在日益高级的社会存在中,则表现为发达组织中的简单关系。与这类关系对应的简单范畴在精神的历史延续中未必在时间上与之对应性地被提出,倒往往是简单的关系在不发展的具体中已经实现,而对应的简单范畴却并未被抽象出来。比如“占有”这种人与物的

原始关系,它作为氏族公社所有权的前提,在原始家庭或氏族公社之前便已存在,并实现为后来的家庭或氏族公社;那时,“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②随后,伴随着简单关系在比较发展的社会中不断现实化,与之相应的简单范畴才在比较发展的具体中作为一种从属关系的抽象保存下来。还是以“占有”为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中,“占有”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但“占有”在雇佣劳动中的实现,则经历着一系列的具体关系过程,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流通关系,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国家形式及意识形态等。与后来这些发展的具体关系相对应的便是比较具体的范畴,它们是这些具体关系的一般性的抽象。于是,就精神获得程序而言,“占有”这一简单范畴,反倒实际上在以它为前提的那些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后被抽象出来。换句话说,规定着比较复杂关系的前提性的简单关系在后来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得以实现时,它才作为前提性体现出来,因此才被抽象出来。

简单范畴由抽象上升为那些具体的比较具体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的获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③简单范畴只有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比较具体的范畴,则在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随着社会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地提升与抽象为范畴,它不仅与作为它前提的简单范畴保持着统一性关系,而且与它所对应的具体保持一种历史性的统一关系。

这里有四个要点可以概括。第一,简单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6页。

畴所抽象的一般，它见于历史的简单原始活动中，并在后来的、延续至今的愈益复杂化的社会活动中一直作为一般的规定性而发挥作用，如生产与消费。第二，伴随社会活动的愈益复杂化，简单范畴的一般也愈益复杂与多样地分化出来，成为不同活动环节与不同活动样式的一般，这类一般便被抽象为比较具体的范畴，发挥着比较具体的活动规定性。如后来在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不同的占有关系与法的关系的一般性。第三，简单范畴向比较具体范畴的分化，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受历史条件制约，对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并归结底体现为历史必然的延续过程。第四，与前提性的简单关系相对应的简单范畴，往往在与较为具体的关系相对应的较为具体的范畴之后被抽象出来，并且获得它所具有的前提性的认识。

把马克思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思路根据其中的类比性联系到文学理论上来，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无论是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方面，还是由抽象而具体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方面，都存在有待在建构中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简单范畴而言，文学理论最具普遍性的范畴，须有两个端点，即文学活动历史源发处的端点和由历史延续至当下的文学活动的端点。只有这样的简单范畴，才能作为文学理论面向文学实践进行建构的抽象起点，即从这样的抽象开始。根据马克思对简单范畴原始追问的方法，可以说，文学理论所研究的文学对象的原始关系，乃是原始的后来被称为具有文学属性的那类活动关系，如原始巫术活动，及由此生发的诗乐舞一体活动、神话吟唱活动、图腾摹仿活动等。这类活动，已在艺术起源这个命题下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学的共源，即文学起源于具有文学属性的活动。不过，文学所由发生的不同民族的活动基点又是各有不同的，由此发生与发展的

不同民族的文学也各有不同。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的简单范畴，虽然不排除世界文学活动的发展端点性的、概括着原始活动关系的简单范畴及相关范畴属性，如古希腊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理式、迷狂、摹仿、悲剧，及后来被尼采强化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等，这些端点根据也不同程度地适应于中国文学活动；但更具有根基性的简单范畴，还须到中国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历史端点去寻觅与发现——当然，这样的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是思维化的抽象的端点，是中国古人最初的对于文学活动的思维成果，也是可以查得到的最初的文字记述。就中国古代文典而言，也就是《尚书》《左传》《国语》《论语》《易经》《老子》《庄子》之类中的有关记述。这类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所提取的文学活动的一般，可以在更为久远的社会活动关系与自然活动关系包括在原始劳动及原始巫术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为他的简单范畴寻找历史端点性根据的。那些古老的文典论述，如言志、载道、取象、中和、适乐、形神、气韵、兴味等，它们又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元范畴。它们作为文学活动的原发的一般性被概括出来。问题在于，这类简单范畴的思维运作却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了断裂，这就是20世纪初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对传统的否定与批判。这种断裂造成中国文学活动的简单范畴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当下文学理论的简单范畴；即是说，由于中国文学活动中最具有现实与历史一般性的简单范畴，没有在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真正地作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思维的起点去对待，抽象的起点性根据便陷入随意与混乱的困境，而由此上升的具体就成为过多受当下实用性支配的具体。简单范畴历史延续性的断裂，不过是文学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关系断裂的思维体现。

其次，马克思所强调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范畴即比较具体的范畴，在当下中国文

学理论中则表现为空缺、孱弱以及混乱。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比较具体的范畴不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而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由简单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文学活动也是这样,在文学活动的历史展开中,一些新的构成关系、规定关系、条件关系出现了,而另外一些相应关系则改变了或者消失了。它们综合地作用于文学活动,使既有文学活动在新的关系构成、关系规定与关系条件中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变化中,既有文学活动形态的变化,又有文学活动特征的变化,还有文学活动的功能、结构、价值、方法等的变化。每一种变化最初都是以一种偶然的具体的状况体现出来的,进而在变化的展开中,同类状况出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于是,这些状况就有了可以被思维的头脑概括为一般的根据。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①以文学传播为例,在原始巫术时代,最初的文学一般即简单范畴如言志范畴、意象范畴,是通过巫术的原始诗乐舞方式,通过看与听而现场传播的;后来的文学书写,使诗从乐舞中得以独立,最初的表现性的巫术言志及意象一般性便进入书写的诗言志及诗意象一般性;书写由甲骨、竹板进入纸张印刷,书写的诗言志及诗意象一般性成为广泛交流、述情表意、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言志与诗意象的一般性。没有广泛交流的前提,就没有述情表意的言志与意象具体化。至于当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手段,把文人专利的诗言志与诗意象充分地大众化、个人化,文人之志变为大众之志、个人之志,文人意象也充分个人化为大众性的幻象、梦象、异象及乐象。文学言志、表象的简单范畴在传播规定性的历史变化中不断地进行差异性的分化、具体化,与之相应,一系列较为具体的中介范畴,如抒情、比兴、形神、气

韵、意境、兴趣等,以及当下电视视频、网络写作等也便陆续地被抽象出来。

从上述思路出发,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具体提升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具体的范畴是简单范畴在历史展开中的复杂化、分化及具体化,它们是历史的简单关系向复杂的社会关系演进的思维体现。简单范畴在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断裂性缺乏,使得由简而繁的历史及逻辑演进过程无法系统地坚持,由此提出的中介范畴往往是缺乏根据的中介范畴。二是当下文学理论中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很多是取自于西论的中介范畴,这些范畴相对应于西方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西方生活理解与文学理解、西方生活现实与文学现实。它们被移植过来,往往未加转化地镶嵌到相应的中国理论文本的章节之中,直接构成文学理论的中介范畴,如存在主义范畴、女权主义范畴、结构主义范畴、新感性范畴、本质主义范畴、图像化范畴等。这类移来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由于既没有历史根据,又没有中国已然展开的具体实践根据,以致出现缺乏体系性联系的理论板块化、拼凑化、观念化。三是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实际上是从历史具体及现实具体中提取的一般性范畴,它们体现着与现实的很密切的对应性。也正因为这种对应性,它们才能有效地进入现实具体,实现由抽象向具体的提升。而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既抽象着一般又敞开于现实的中介范畴,常常被观念性地封闭于现实具体之外。比如“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比较具体的范畴,应该贴着当下中国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建构。这样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西矛盾,传统与当下的纠结,大众与精英的互动与互化,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与文学活动的互构关系等,便应是“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中介范畴向现实具体敞开的要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

然而，现有的代表性阐释，却把自己封闭在抽象的理论条文之中。^①而这样的理论条文，如马克思所说：“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

三、范畴抽象及范畴研究要在范畴的相互关联性中展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生产时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③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都是就个人而言，个人的独立性比其他事物或社会现象的独立性似乎要大得多。那么，如何对待生产的个人及个人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坚持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就是从整体中把握相互关联的具体，为此，他抓住个人这个出发点。他指出，个人总是进行生产的个人，他们总是从属更大的整体，先是家庭，后来是氏族公社。到18世纪的“市民社会”，个人成为通过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实现其私人目的的社会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④被西方看重的独立的、个性的人尚且在社会关联之中，关联性地而不是孤立地把握一切具体，自然就不言而喻。

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的相关性谈生产与消费，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也直接是生产。它们每一方都直接是各自的对方。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互是关系，又体现为互为媒介的关系，即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使消费获得对象；同时，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因此成为主体的产品。从消费来说，消费使产品现实化，又使生产通过生产动力与生产的观念形态实现为生产。与之相应，从生产来说，生产不仅为消费提供材料与对象，给予消费以规定性从而使之完成，它还还需要提供材料并为材料提供需要。为此，

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⑤

在“生产和分配”、“交换和流通”这类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马克思同样运用着揭示相关范畴的关联性，并在关联性中思考相关范畴的方法。他由关联进入关联范畴的内部，把关联范畴的内部构成放到关联范畴的关联规定性中思考，又把这种合于关联性的范畴思考适时转入关联范畴关联性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是经常地由关联范畴切入关联范畴对应的现实与历史具体，从现实与历史具体中，发现相互关联的一般，并将之抽象为关联范畴的关联性及范畴构成性研究。比如他针对将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进而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的现象，从分配与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荒诞无稽的做法、从分配与生产关联性角度指出，分配不是外在于、独立于生产，而是密切地关联着生产，并且就在生产内部。生产方式决定新出现的分配方式，“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⑥

马克思坚持的这种关联范畴的关联性研究方法，即它们的相互规定、相互构成、互为彼此的方法，在中国当下文学理论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

对关联范畴割裂其关联性的研究，是文学

① 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在重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有集中阐释。这是目前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代表性的阐释。阐释集中在公有制，按劳分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及指导思想五个方面。从理论条文说，这都是对的，但就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而言，却没有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具体敞开。它的向现实具体提升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参见重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理论并不少见的研究思路,比如割裂对象而研究主体,割裂内容而研究形式,割裂接受而研究文本,割裂传播而研究接受等。这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后遗症。其实,西方1960年代以来已着手展开对这种二元论的规模性的批判。中国当下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体例划分,存在着僵化于横向的板块式分割的情况,如从文学性质到文学活动,常常被各分为一章,性质与活动的一体性关系,成为范畴分立的关系。而实际上,性质的活动与活动的性质,二者不仅是机能的,而且是依存的。割裂的结果是,唯有在有机关联中才能见出的性质与活动互为、互化、互为提升的关系属性被掩盖了。文学创造与文学作品的分编式平列,不仅使创造研究成为非文本的研究,沦为不见文本整体性的心理研究,而且,文本研究又由于割裂了创造主体与创造活动的有机整体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文本中心论的误区,一是生硬的文学形式分类的误区。在生硬的形式分类中,文学作品在文学创造中与创造过程相互推动、变化流转的充满活力的东西便被剔除了。而缓解的方法,在当下代表性文学理论教材中是补缀式的,即在章节陈述的缝隙中,补缀一些彼此照应的例证或文字。但割裂所致的生机缺损却无法在补缀中找回,当然更谈不上生机盎然。^①

解决这类问题应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关联的范畴提取及整体性综合的研究方法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在研究中并没有就生产类型、生产手段、生产性质、生产活动、生产功能这类可以进行逻辑类分的方面进行分类,而是在生产的历史延续性中,由伴随着生产、规定着生产、构成着生产的东西进行范畴提取,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使得提取的范畴成为生产的历史关联性范畴。这是一种纵向分类的方法。就文学理论来说,历史纵向的范畴分类,如文学形态范畴、文学个性范畴、文学实践范畴、文学演进范畴、文学主体范畴等,它们共同地综合为历史性的文学活动,又在文学的现实活动中有机

综合地展开,彼此相关联地发挥文学活动的整体性作用。马克思对这样的关联性分类解释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这里,总体、统一体、相连贯的环节及内部差异,是提取关联性范畴的要点所在。

四、范畴与具体的现实对应性及 范畴对应具体的中介性、 变化性

文学理论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一是它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哲学思辨的世界的一般情况及一般世界的构成情况和变化情况,而是现实具体的文学活动及具体文学活动的一般,它研究这种一般的构成与变化。二是它用以研究一般的文学或文学具体的一般的方法,主要是范畴转化的方法,即由简单范畴转化为比较具体的范畴再进而综合为具体,而不是思辨哲学的范畴推衍的方法及被一定方法论限定的哲学目的性运作的方法。三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过程是由简入繁、由一而多的——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思路,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在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展开,也可以通过某些中介范畴的分化与细化进而向具体提升,但它总是要面向具体、贴近具体,并在具体中提升——思辨哲学与此不同,思辨哲学是对于一般的立论与论证。它的立论出发点往往就是它理论论证的结果,它是锁定在一般中的一般范畴的旋转。旋转指向上一级的范畴或下一级的范畴,支撑这种旋转的是思辨逻辑。

^① 这种割裂范畴关联性进而又进行补缀的做法,2004年由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就曾尖锐地指出,这是“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即“把中外古今‘相关’言说加以肢解,在完全不顾其文本语境,更不用说社会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拼凑起来”。这种割裂式的补缀的情况,至今仍然很普遍地存在着。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在理论构成性、具体性及方法性上可以对文学理论给予意义重大的引导，就在于前者在理论展开中自觉地使自己区别于思辨哲学。它坚持由现实具体提出问题，从简单范畴出发，经由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达到思维的具体综合。这里的要务就是在简单范畴或者在已然可以作为出发点的比较具体的范畴中面向具体地分解出进一步的中介范畴。而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便是比较具体的且又面向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匮乏。

这类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该如何取得呢？马克思谈及分析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走过的历史道路时说：“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① 马克思这段话是为了说明至他写《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个时候，经济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从生动的具体中找到了一些相应的抽象范畴，因此可以从这些范畴出发，而不是再从生动的具体出发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不过，马克思这段话更有一番深意，即讲明了抽象范畴，包括可用于进一步的具体综合的比较具体范畴的由来：第一，它们总是产生于生动的具体而非产生于概念或观念；第二，它们是对所由开始的具体具有某种决定意义的关系；第三，这些关系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在其所由开始的具体中体现出普遍性或一般性的关系；第四，它们被确定与抽象出来而成为范畴；第五，这些范畴可以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研究中去，即便这些具体是这类范畴所由来的既有具体的新的发展。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在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方面出现匮乏，就是因为在上述五个要点中，忽略了某些要点。拿既有文学理论中多

有争议的形象思维这个范畴来说，按照马克思从简单范畴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思路来看，形象思维是想象这一简单范畴的比较具体化。想象是自古以来所有文学活动的最具一般性的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的心理关系，形象思维则是在脑科学及思维科学达到一定水平时对想象的思维学研究，这使想象在思维中得到比较具体的限定，并获得限定性的进一步思考。中国上世纪中后叶的两次形象思维大讨论，正是在这一比较具体的范畴上展开的。^② 不过，就在这一范畴本该在更具体的方面加以引申，从而进一步切入文学活动具体的地方，向具体提升的讨论却结束了。形象思维通往具体的那些更为具体的环节，如形象思维的语境关系、情境关系、文体关系、接受关系、表述关系、语言转换关系，它们构成形象思维范畴向文学活动具体提升的递进式的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根据，以及这类可以提升为中介范畴的问题等，都已经随着大讨论来到了门口——当时，甚至有一些文章已涉及了这类问题。但是，由于讨论的重要参与者们缺少这种中介范畴意识，因此未能敏感地做出范畴提升的努力，在过后的反思中也未将之作为理论的缺失而予以反省。^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② 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关于形象思维论的几个问题”），对形象思维的两次讨论进行了概括，其中涉及的讨论要点、讨论的历史原因、时代状况，代表了文论学界的普遍看法。该教材对此进行的展开式阐释，也有理论深度。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③ 在形象思维问题上，有丰富文学读解经验及理论研究功底的重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设专章讨论文学构思问题。他没有采用形象思维这个范畴，而是延用了构思这个说法。构思是形象思维的具体化，它沉入到创作具体中，但由于这类范畴缺乏更具一般性的上位范畴如形象思维的向下提领，则该教材的构思范畴没有达到这一范畴应有的一般性抽象的力度。当然也可以选用其他范畴称谓，但应具有与形象思维范畴的等位性。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虽然对形象思维有精要阐释，但却止于形象思维的构成性分述，因此缺乏向具体提升的力度。这类问题一沉一浮，都说明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建构问题，是应该引起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参见《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第122~131页。

比较具体的范畴从对应的关系一般中抽象出来,它的一般规定性是随着它所对应的具体关系变动的,而不是一经抽象便作为恒常的尺度悬挂在变动的具体之上并不断地对后者施以制约。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①这段话强调了比较具体的范畴的直观与表象的根据——毫无疑问,直观与表象是直接的对象性反应,它们保持着对于对象的感性的鲜活性,而不是被陈述所加工的事实,当然更不是道听途说的或在反省中思考出来的二手事实。这样的强调是在保持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关联着具体的活动力,及前者随后者而变化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才选用“过程”这一紧随对象变化而展开的概念。范畴运作的理论思维,无论那范畴怎样的比较具体,它也是思辨地理论地活跃着,而不可能实践地参与到具体中去。但这种不直接参与所造成的范畴与具体的隔阂,却可以通过一定的理论方法求得解决,即把理论思考或理论综合的具体,过程性地、经常地浮现在表象面前,通过思维中据实而变化的表象(表象是思维的具体形态),求得范畴对于具体的对应性转化。

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提取比较具体的范畴,又在具体的转化中思考与运用这类范畴,这是克服文学理论观念化的有效方法。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常常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观念化倾向。

一种倾向是非语境地套用西方观念与范畴的倾向。观念化与观念地思考与把握具体对象不是一回事。通过范畴去把握具体对象,亦即观念地把握对象,这是理论把握对象的基本方式。观念化的问题在于把观念从它所由来的具体中割裂出来,使之成为远离具体甚至无所具体的观念,进而在孤立确定的意义上运用这类观念。尽管它所运用的对象可能是具体现实的,但只要这观念没有对应性的具体根据,并且这

观念内容没有或无法把它所研究的具体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观念所由生成的表象面前,这就是观念化。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对于西方理论中的一些观念或范畴,不顾这些西方观念或范畴得以产生的西方社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与中国某些对应性的具体存在差异,硬套到中国社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中去,则这类观念就成为观念化的观念,这类范畴也就成为范畴化的范畴。这种观念化的做法确立在一个荒谬的前提下,即认为西方的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在具体性上是等值的。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门话题,如后现代话题、大众文化话题、图像化话题、道德话题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观念化倾向。^②

另一种观念化倾向是使文学理论疏离于文学活动的现实。本该作为前提经常浮现于表象的社会生活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被既有的一套观念或范畴阻隔在观念既定的规定性之外。这些观念以自身的不变规定着具体现实的变化。由此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具体现实的手足无措,具体现实仍然具体现实地活跃与发展着,而是观念化或范畴化的观念与范畴,它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理论城堡中,或者在观念化的西论中寻找理论乐趣,或者满足于理论的自娱自乐。

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承上启下、居内而拥外的中介性,这是当下文学理论建构中已然引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

② 如对于大众文化所引发的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争论问题,近年来国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争论的基点问题确定在西方的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对立观点上,或此或彼或调和地阐述己见。但问题在于这种前提性的基点即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在中国很少存在类似西方导致争论的界限。中国的所谓精英文学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某种意义的大众文学,而中国大众文学也一直就是裹挟着、参与着、生成着精英文学的大众文学。他们的当下一体性在于都是于混乱的市场经济中成为当下状况,又都在当下状况中追求基于趣味的商业价值。而且,这趣味差异又绝非文化差异,而只是同一文化群体中人的感性生活状况的差异。所谓精英群体内部的这种差异,比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群体间的差异往往还要巨大。由于这种对应性的研究是套用自西方而无关中国社会生活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的研究,因此多年来难以推进。

重视并展开讨论的话题。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等先后被国内学者引入并进行讨论。但讨论没有深入到使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方法改变其决定性位置的程度。不少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二元分立乃至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文学活动研究中创作与接受分立的做法、创作研究中风格与接受分立的做法、接受研究中接受与传播分立的做法、文学的美学研究中美与美感分立的做法、文学的生存论研究中人与环境分立的做法、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分立的做法等，这些做法于当下的普遍运用，证明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范畴中介的研究方法，仍需要被认真理解与接受。马克思早在巴赫金、哈贝马斯之前，已对这种方法多有阐释并运用自如了。

比如在阐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发问：“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①这实际上便是对分配的中介属性的发问。他对此解答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当做生产要素；（2）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②分配作为中介，使资本既获得生产属性又获得分配属性。因此，他进而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③“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④根据这种中介范畴理解，马克思不仅提示了中介范畴对于中介各方的联系，而且指出中介范畴构入中介各方，就其构入来说，也就是中介各方。

在文学理论中仍有很大理论份额的二元论，应该在中介范畴的设立中得到进一步解决。比如上面提到的文学活动审美属性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美与美感二元分立的情况，其实，从现

实具体而言，它们是一体的。然而，分立性研究却造成了一种现实具体的假象，即在现实具体中美是美，美感是美感。要解决这类二元分立的问题，就特别需要中介思维方式，即审美是活动性的，它是美与美感的中介。就此理解，审美不仅使美与美感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审美观赏、审美感应、审美趣味、审美评价等中介性活动，构入美和美感，并使美与美感相互构成。由此，生动的审美具体，亦即美的具体、美感的具体便综合起来——美因美感而美，美感因美而存在美感；美在美感中并且就是美感，美感也在美之中并且就是美。

五、逻辑方法是唯一适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但逻辑方法又实际上是摆脱了历史形式的历史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学这类由具体出发、从抽象入手、经由比较具体范畴的逐步展开，进而实现具体综合的学科中进行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文学理论正属于这类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理论学科，它对逻辑关系的处理，在马克思这里自然可以得到深刻指导。

马克思追溯政治经济学的简单范畴及比较具体范畴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历史方法，他不断到历史中寻觅追溯、进行求证。不过，马克思的历史追溯又牢牢地站立在他追溯的现实立足点上，即他所研究的身在其中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他认为经济范畴的逻辑次序不仅是由它们在历史上的先后次序决定的，更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内部组织，有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的观念认识。此前不同社会内部结构的决定次序,此前不同历史阶段的观念认识次序,对于后来的社会内部次序,都必须在当下的社会结构和观念认识中找到根据并予以调整。马克思说:“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①这个说法对于当下文学理论的逻辑引导意义是使当下文学理论建构有了更坚实的逻辑基点即立足于当下——当下的对象性问题,当下的对象性状况,当下的理论问题,当下的理论研究状况。而更重要的是,当下并不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限定,而且是产生出有待研究的问题的当下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结构。

对于这种形成次序的逻辑,在坚持立足现实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次序进行了阐发。恩格斯从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历史意识中分析马克思思维逻辑的由来,他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因此,虽然黑格尔颠倒了实在与思维的关系,但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在他的哲学中。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线索的问题,即思维的逻辑线索与历史展开的线索。黑格尔的逻辑思维线索虽然是颠倒的,但他在历史线索中获得的历史感,却在他颠倒的逻辑思维中有充分的体现。对历史线索与逻辑线索的关系,恩格斯进行概括说:“逻辑的研究方法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

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逻辑是摆脱了历史形式及各种偶然因素的历史抽象,这种抽象印证了头脑中的东西,包括思维逻辑,都不过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但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反映,它使得头脑中的每一个成熟的思维要点,都可以在典范式的时间发展点上有所着落。这是一种把时间性与逻辑性结合起来形成思维次序的方法。这种时间性不仅体现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发展点,而且,体现为构成历史发展点的各种活动的展开次序。因此,它也为由简单范畴到中介范畴、由此类中介范畴到彼类中介范畴,其间的关联次序提供了逻辑展开的根据。

这种综合着历史线索的逻辑阐释,可以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加以思考。

(一) 中介范畴的关联逻辑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有一些可以转化提炼为中介范畴的范畴,分布于现有理论的板块结构中。现有理论板块,性质论、创造论、作品论、接受论等,在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都与文学实践相关联。这种关联,不是既定的逻辑形式,而是与实践的历史状况相关。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有些板块或板块间的中介范畴被突出了,有些弱化了;有些产生了,有些消失了,由此形成一定的关联次序。把逻辑形式与这种次序统合起来,才能求得关联性展示,而这种关联性及关联性展示,正是当下文学理论所欠缺的。文学理论忽视中国相关历史关系的差异性,套用西方理论或者以西律中,与逻辑运作的这种欠缺有关。范畴关联在历史实践中的逻辑变化,如马克思分析产生一般的各种规定范畴的变化时所说,它们“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③。这是他从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史关系差异性出发对逻辑关联进行的阐释。

（二）以文学实践的过程顺序为中介范畴的关联顺序

文学实践从目的提出，到方法运用，到过程展开，到过程性调整，到目的达成，这既是物质性的活动过程，又是精神展开的逻辑过程。整个过程，有各种中介范畴联络其中。如就接受而言，便可以凝练出一系列中介范畴，包括接受的期待视野、接受阅读、阅读理解、阅读状况、先在经验、阅读经验转换、经验增殖、经验调整、接受反思等，这是在接受过程的先后联系中形成的范畴。接受过程的先后联系提供着它们相关联的逻辑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生产与消费的过程顺序便被视为逻辑展开的顺序。

（三）问题性关联

无论是理论提出的问题还是实践提出的问题，问题的共同点在于这是某种关联（在理论上是范畴的逻辑关联，在实践上是过程的内部关联与周围关联）的重要性在研究中或在实践

中的凸显，这种重要性此前并没有体现出来而是被忽略的。这种重要性的显现，是这种关联倘若不被求解，则被关联的各方面便会陷入矛盾或混乱。问题性关联，是与问题相关的各种关系根据其对于问题的相关程度而获得的次序。马克思称这类重要的问题关系与其他相关关系的关联为“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关系。^①这样一来，问题便以其关系的关联性，把关联的各方面带入问题进行求解，相关理论或实践的中介范畴便在相应的关联中获得次序，从而被凝练、被阐释、被关联。

本文作者：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Implications of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mediary Category of Literary Theory for Literature Practice

Gao Nan

Abstract: The binary thinking method and the ideation method, which are currently fetter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igidify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distance it from the literature practice. In this respect, Marx's research practice i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devoted to address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he logical method he employed by ascending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fic will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guiding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make a breakthrough. Moreover, the specialized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is method in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larify and highlight its significance. From simple categories to concrete categories, from category relevance to the interaction of related categories, from the thinking on category rela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from the reality, from logical thinking to the historical manner of thinking, the series of methods that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eals and applies gives us a hint of how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practice; intermediary category

高楠教授简介

高楠，本名高凯征，1949年生，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学术带头人，辽宁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艺思想研究”学术带头人，辽宁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学术带头人。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国模范教师、沈阳市第二届优秀专家，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著有个人学术专著19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学术影响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7年出版的当代美学家评述专著《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是当代美学思想研究的首批著作之一，其价值在于首次阐发了蒋孔阳“总体把握审美关系的实践观点美学”的学术地位；1989年，在全国文艺学方法论讨论之初，出版42万字专著《艺术心理学》，该书两次印数达5万册，1993年作为大陆第一批学术成果与中国台湾地区交流，由台湾地区复汉出版社再版；1992年出版专著《民族精神与时代走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精神及社会转型期时代发展的著述之一，该书获得当时中国青年文化读物最高奖项金钥匙奖；同年出版《道教与美学》，这是全国第二次美学大讨论热潮中从宗教学角度研究美学的首批著作之一，是一部为中华美学寻根的著作；1997年出版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专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这是中国最早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著作。

进入新世纪，集中研究根基于中国传统生存论的当代生存论课题，抓住中国传统生存论的有机整体性、生成流变性、浑融互构性特点，借助西方生存论，又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中超越西方生存论，进行了中国生存文学理论的开拓性建构，于2001年前后推出三部专著《生存的审美问题》《艺术的生存意蕴》《文化与生存的文论之思》；2005年以后，针对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理论冲击下存在的以西律中、自我迷失情况，集中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建构与特色问题，以及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整体性与体系性问题，先后出版专著《文艺学：传统与现代的纠葛》（2005年）、《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2011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论建构》（2013年）；其中2008年，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结项出版，该书因体现了“勇于介入当下学术现场的学术意识”特色，获得中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2015年国家社科项目“文学的道德命题”获优秀结项，并入选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人民出版社以《文学道德论》为名出版。

近些年，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国家“211”工程项目3项（“九五”项目、“十五”项目和“十一五”项目，均为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项目总负责人），辽宁省社科项目多项。学术成果多有获奖，曾获得辽宁省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左 杨）